

印迹 TRACES 트레이シーズ 흔적

A MULTILINGUAL JOURNAL OF CULTURAL THEORY AND TRANSLATION

本辑主编 托马斯·拉马尔 姜乃熙

现代性的影响

IMPACTS OF MODERNITIE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3

印迹 TRACES 트레이シーズ 흔적

A MULTILINGUAL JOURNAL OF CULTURAL THEORY AND TRANSLATION

本辑主编 托马斯·拉马尔 姜乃熙

现代性的影响

IMPACTS OF MODERNITIE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影响/(加)拉马尔·(韩)姜乃熙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2
(印迹:3)
ISBN 978-7-5343-8637-4

I. 现.. II. ①拉..②姜... III. 现代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2800 号

书 名	现代性的影响 ——“印迹”(3)
编辑主编	托马斯·拉马尔 姜乃熙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盐城市纯化路 29 号(邮编 224001)
电 话	0515-88153008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 000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8637-4
定 价	30.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260760,83260768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宗 旨

《印迹》是一份多语种文化与翻译理论刊物,倡导一种关注在各特定地方所产生的理论知识在全球留下的印迹,以及探讨理论自身是怎样由各不同地点的实际社会关系所产生和改变的比较文化理论。我们急切地寻求产生于完全不同地区的理论,包括那些过去几个世纪中常常由于殖民与半殖民而形成的与北美和西欧“理论”混杂关系中所产生的重要著作。我们所发表的研究,观点交流和评论,将面向多语种的读者,除了包括像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文化比较中的自我中心研究,以及批判种族研究,或后殖民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外,也包括各传统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同时,《印迹》也意在发起一种不同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与经验材料,不同理论思想本身,在世界上的不同思想对话与争论的传播方式。

《印迹》用中文、英文、日文、韩文等语言出版,各语言版本间保持一种弹性的互动关系。每一位撰稿人都将完全理解,她或他可能是在为完全不同的、多种语言的读者写作:就像一位殖民统治下的当地知识分子一样,每一位撰稿人都须注意这种多向性。《印迹》是一份国际刊物。在本刊所运作和维护的这一国际性空间内,无论是撰稿人还是读者都会受到邀请,然而它又根本不同于所谓国际主义的刊物。那种刊物是建立在某一主导语言对其他弱势语言的主宰性基础上的。确实,我们希望,这一我们在其中争论和交流的社会空间将要挑战民族和民族语言所构成的空间。这一空间由翻译过程构成,有多种语言和人员参与,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和争论,通过作者、评论者、翻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争论而得以实现。

执行委员会

汪晖(北京);高建平(北京);王晓明(上海);金恩实(首尔);墨美姬(香港);鹤饲哲(东京);Yann Moulier Boutang(巴黎);小林敏明(柏林);丁乃非(桃园);酒井直树(伊萨卡);Thomas LaMarre(蒙特利尔);姜乃熙(首尔);小岛洁(东京);Brett de Bary(伊萨卡);花轮由纪子(纽约);J. Victor Koschmann(伊萨卡);Brian Massumi(蒙特利尔)

编辑

墨美姬 Meaghan Morris(香港)

副编辑

高建平(北京);Thomas Lamarre(蒙特利尔);姜乃熙(首尔);小岛洁(东京);Brett de Bary(伊萨卡);花轮由纪子(伊萨卡);J. Victor Koschmann(伊萨卡).

编辑委员会

Eric Alliez(巴黎);Ien Ang(悉尼);Dipesh Chakrabarty(芝加哥);赵刚(台中);平谢(柏克利);钱永祥(台北);荆子馨(达勒姆);崔贞茂(厄湾);Choi Jungwoon(首尔);丁荷生(蒙特利尔);傅大为(新竹);Christopher Fynsk(宾厄姆顿);Johnny Golding(伦敦);Elizabeth Grosz(纽约);Michael Hardt(达勒姆);黄平(北京);姜尚中(东京);John Namjun Kim(伊萨卡);金素荣(首尔);John Kraniauskas(伦敦);罗永生(香港);Oliver Marchart(维也纳);Alberto Moreiras(达勒姆);Antonio Negri(巴黎);冈真理(大阪);Peter Osborne(伦敦);崎山政毅(神户);Ulrich J. Schneider(沃尔芬比特尔);Gabriele Schwab(厄湾);沈光贤(首尔);苏哲安(台北);富山一郎(大阪);Thongchai Winichakul(麦迪逊);于治中(新竹);孙歌(北京);王柯平(北京);赵京华(北京);吕新雨(上海)

顾问委员会

Ben Anderson(伊萨卡);Etienne Balibar(巴黎);Tani Barlow(西雅图);Anne Berger(伊萨卡);Nora Bierich(柏林);Sandra Buckley(蒙

特利尔);陈光兴(新竹);赵惠净(首尔);瞿宛文(台北);蔡明发(新加坡);雅各·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巴黎);Catherine Hall (伦敦);Stuart Hall (伦敦);Harry Harootunian (纽约);Iyotani Toshio (东京);柄谷行人(大阪、纽约);Benjamin Lee (休士敦);Lee Chonghwa (东京);廖炳惠(新竹);苔莎·莫里斯—铃木(堪培拉);Timothy Murray (伊萨卡);Jean-Luc Nancy (斯特拉斯堡);成田龙一(东京);James Siegel (伊萨卡);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纽约);张胜勇(南京)

附录

附录一 美国现代主义文学(香港)

附录二

附录三 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台北)

附录四

附录五 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大陆)

附录六

附录七 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大陆)

作者简介

白培德 (Peter Button) 系麦吉尔大学教授, 曾研究过中国美学家蔡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他与李杨合作出版过《文化与文学: 世纪之交的凝望》一书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 年)。他目前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后解放的文学和电影中的图像。

丁荷生 (Kenneth Dean) 是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的中国研究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始皇帝和末代皇帝: 绝对国家与专制政体》(与布里安·马苏米[Brian Massumi]合作)、《道教仪式与中国东南部的民间崇拜》和《三清合一: 一种宗教崇拜在中国东南的传播》, 以及数卷有关福建宗教史的《碑铭材料研究》。

米歇尔·戈达德 (Michael Goddard), 悉尼大学艺术史系博士候选人。他目前从事维托尔德·冈布罗维奇 (Witold Gombrowicz) 与德鲁兹 (Gilles Deleuze) 的美学理论的关系的课题研究。他曾经发表过论新西兰和波兰的电影, 后结构主义哲学, 以及波兰的现代主义和电影理论方面的文章。

哈里·哈鲁吐尼安 (Harry Harootunian) 是纽约大学历史教授和东亚研究系主任。他最近与依田伴都 (Tomiko Yoda) 共同编辑了一期《南大西洋季刊》专号, 名为“千禧年的日本”。

洪承泰 (Hong Seong-tae) 在韩国原州市的尚志大学讲授社会学。他研究与生态学和信息论相关的问题。他曾经将乌里奇·贝克 (Ulrich Beck) 的《风险社会》译成韩文, 并于 1997 年出版。他自己的著作包括《赛博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和《风险社会之外》。

姜乃熙 (Kang Nae-hui) 在韩国首尔中央大学英语系讲授英语。从 1992 年起, 他担任《文化/科学》杂志的发行人, 文化行动执行委员会主任。他主要研究殖民现代性以及韩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运动相关

的问题。他的最新著作是《新自由主义与文化》，由文化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托马斯·拉马尔(Thomas Lamarre),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他出版的著作包括《揭示平安时代的日本:银幕上的感性、文字和阴影的考古学》。他近来为日本论坛编辑了一辑题为《在电影和动画之间》的书。

罗永生,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他在悉尼技术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协作的殖民主义:香港的中华性竞争谱系》。

伊桑·纳斯拉丁-朗戈(Ethan L. J. Nasreddin-Longo),作曲家,美国加利福尼亚河边大学民族音乐学助教授,研究兴趣为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研究西方艺术音乐、都市音乐学,以及中爪哇加麦兰。发表的作品包括《自我性、自我身份,肤色及其复杂性:奥利·威尔森的组歌的语境》(《黑人音乐研究杂志》1995)。所演奏的作品有《Σ(与悲伤)》、《召唤冬天的树与失去的时间》(当代室内演奏),以及《给所爱的人的坎佐尼短歌》(T-Tet)。近年来的作品有《九人交响曲:对暴力的四个回答和主日圣餐》、《对莉莉·哈恩和伯纳德·肖尔茨的沉思》,两部作品都在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的2002—2003演出季首演。他目前的作品计划包括《长笛、单簧管、喇叭和弦乐三重奏》、《爱情与癌症的抒情曲》。目前,他正在从事自传的写作、社会实践,以及一部题为《珍妮特·杰克逊对某些主题的幻想,或回到红发男孩》的音乐录像制作工作。

孙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她的著作包括《文学的立场》和《亚洲意味着什么?》。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日本思想史上的现代性问题。

上田敦子(Atsuko Ueda)在位于尚佩恩-厄班纳的伊利诺斯大学工作。她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现代日本文学、比较文学、翻译理论、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她最近发表的文章包括《文学的非政治化: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私人化状态》,发表于《日本文学研究中的正典性与正典结构》(PAJLS 1)2001年8月。

目 录

托马斯·拉马尔	1	引论:现代性的影响 高建平 译
哈里·哈鲁吐尼安	31	幽灵似的比较 贾茜茜 译
孙 歌	44	寻找“近代”——来自日本的思考轨迹
罗永生	60	“我们的逻各斯?”——解读庄子、德里达和列维纳斯之间不可言说的伦理学 丁国旗 译
(韩)洪承泰	102	殖民地近代化之路——从白岳至汉江 于翠红 译
姜乃熙	117	终结词尾“-다”与韩国语言的近代性 于翠红 译
伊桑·纳斯拉丁—朗戈	143	民族音乐学的矛盾性 贾茜茜 译
上田敦子	155	殖民两面性与“近代小说”:关于《小说神髓》与“脱亚” 贾茜茜 译
米歇尔·戈达德	175	褶皱、电影和新巴洛克现代性 智玉琴 译
丁荷生与托马斯·拉马尔	194	探询仪式的意义 魏朝夕 译
汪 晖	226	科学世界观、文化论战与知识的再分类
	251	附录

引论：现代性的影响

托马斯·拉马尔

现代性与某种变化有关。它表示某种新的东西出现——新的方式或形态，甚至也许是新的存在方式。此外，它一般说来，还含有一种对新的或现代的东西的正面评价。对西方现代性的讨论常常回到“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一场关于现代胜过古代的争论上来。这场争论说明现代性并非仅仅与一般性变化有关。它产生出一种新的胜过老的、当下胜于过去的意义，潜藏着一种更加光明、洁净、健康、自由，更富有的意思。关于新的和现代的话语彻底地改变了与过去的关系，现代性因此而逐渐与我们今天称为进步之神话的思想相吻合。“过去”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久远而清澈的源泉，只要后代的人致力于维护古老的沟渠河道的话，就将不断地滋养和荡涤他们。“过去”变得黏浊，成为一种原生性的泥浆，需要一种持续的英雄性的努力去淌过去，将它置于控制之下。

换句话说，现代性话语是一种提供了一套特殊的时间关系和历史价值的话语。(一般认为)人们在一段时间里在使用这些话语时，是站在现代一边，肯定新的东西，将变化看成历史的进步。然而在今天，对变化的思考本身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关现代性的时间与历史的关系不那么容易证实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新事物证实中天生就有着某种矛盾。新事物似乎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现在还不是。在什么情况下，某种新的东西可以表现出不再“只是某种新的东西”，即有某种不一样。其结果是一种永恒的当下，在其中一切都只是“新的”，而没有任何特殊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任何真正新的东西。尼采指出了一种现代性的神经症：当新或现代成为理解历史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之时，当下并不是接替过去，而是彻底与过去决裂。

奇怪的是,现代性因此而成为一种永恒地更新的文化,并因此而变得否定变动或变化本身。一切都在不断地被更新,没有什么变化。现代人开始神经质地在过去与当下的扩大与缩小关系之间摆动。如果他们缩小自身与过去的关系,他们就通过不可避免而迅速地陈旧化而为当下所消费。他们也许因此而努力增大他们与过去的关系,但这种逃避陈旧化的努力是无效的,它显然对变化持否定的态度。换句话说,在现代人所赞同的历史关系的核心之中,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反常性。正是这种反常性,最终使得历史变化似乎在实际上不可思议。

变化是一个潜在的暴力事件——尤其是那种与现代性有关的变化,就更是如此,它以一种时间上的中断或破裂的方式出现。尼采所说到的历史神经症到了今天已经成了全球性的危机。人们也许会说,西方(不管这个词取什么意思)在做着绝望的努力来摆脱其自身的陈旧化,最大限度地利用神、理性、规律或逻各斯的名声和圣洁性,借助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以突破过去。因此,世界其他地方也许会被召唤来肯定西方的统一性,这(具有讽刺意味或异乎寻常地)被等同于不考虑现代性而对统一可能性作一般性肯定。如果要保持现代性,那么暂时的突破、历史性破裂,以及全球的危机就必须不断被接纳与否定。这种时间上的悖论所形成的历史的神经症成为日常恐惧的政治学:每一件事物都中断,没有变化,一切都在危机之中。

现在,对现代性的批评性讨论似乎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现代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总体化的问题。不管评论者将现代性问题说成主要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与工业化、帝国的扩张、制度的现代化,等等,有关),或者更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理性化的方式、主体的构造、身份的本质化,等等),或者二者兼有之,都是如此。面对现代性问题,也许还有它的影响,是面对总体化力量、过程、结构、构造或者逻辑,即资源、交换、机构和人群的坚持不懈地体系化、同质化、整一化、标准化,以及全球化过程。也许,说对现代性的各种批判在此点上“达成一致”是夸大其辞。这是由于这种一致意味着某种汇合,或者一种共同的出发点。相反,总体化的问题不断出现,也许,与其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或争论点,不如说处在一种不可解脱的混乱状态,其中的讨论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毕竟,现代性问题也是总体化,即现代化问题。

然而,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人们做出

种种将现代性(作为文化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作为社会性的现代化)区分开来的努力。那种将现代性从现代化中完全独立出来的论述,仍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是因为,显然,某种程度的共谋总是存在的。然而,现代性与现代化并不是同样的东西。问题在于,首先是作为一种时间性标尺的现代性,是怎样与现代化,即与总体化的力量或过程联系在一起?问题的回答存在于时间的中断或历史的断裂的观念之中,而这种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总体,并因此而根本的。时间断裂的逻辑可被放入到总体化的过程之中,甚至成为这个过程的基础。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对新的东西的强调,很容易产生对更加新的东西的欲望,产生对整体性的欲望,这就将一切都整合到了一个永恒的当下之中——照尼采看来,从这里出发,就产生了对新的非基本的价值的需要。

其次,存在着一个具体的时间关系(现代性)逐渐意味着一个具体的地缘政治关系(西方相对于其他)的相关问题。显然,现代性与它的“先驱”(古代、传统、前现代、古典、古老的,等等)之间的关系不断被用来标志着一种在西方与它的地缘政治上的他者(构成像东方、第三世界、南方,或者干脆说,世界的其他地方)之间的区分。现代性宣布了一种似乎无法抹去的对西方与其他的区分,以及一种现代与西方化的恒定的结合。如果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关系,常常与地缘政治的整体性(即西方化)结合起来的话,正是在移置的基础之上,现代性的运作成为一个整体的断裂。简单地说,时间的断裂是一个空间化,它移置与驯化断裂的暴力。断裂不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仿佛是移置。

最后,是否还存在非总体化、非现代化或西方化的处理空间与时间关系的今天的方式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这是一个人们是否或怎样才能有效地反对或绕过整体的方式、逻辑或构造的问题。这是一个讨论后现代性和后现代时不断出现的问题,它常常在“后”这个词所隐含的它们自身的总体化姿态,即宣布与现代性的历史性决裂的基础上被否定。然而,也许还存在着不同于历史决裂的其他考虑现代与后现代关系的方式,例如,作为一种对现代性之内的某一时刻的强化,也许根据一种反模态的方式。

然而,总体化的问题在有关现代性讨论中持续出现,似乎对它们起关键的作用。毫不奇怪的是,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常常受反总体化策

略、战略性选择的总体化,或者非总体化的区分制度所制约。对于破坏、推翻,或以某种方式毁灭或分解现代总体性的所有的批评努力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展示这些努力不仅仅是去总体性的。(或者说,它们至少必须显示出对去总体性问题的意识)由于非总体化——一个简单的量的碎片或现代性时间与空间的复数化(许多较小的现代性)——倾向于产生出种种大同小异的文化,因而又使自己向着一种重新总体化开放——这是一种包含着同类型民族或可供消费区域的超现代性或全球化。那么,这里的关键是,不要对断裂作简单化理解,这种关系本不会导致量化。用复数的现代性和复数的影响来谈论本身并不能解决现代总体化的问题。毕竟,这种现代性的增殖化并不如此简单,只与量上的增殖有关。如果说,现代性不再仅仅存在于西方并只是与西方有关的话,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这正是重新对变化进行思考的开始。

然而,这种当下对现代性讨论的一般倾向似乎令人相当沮丧。许多的批评都恰当而有说服力地围绕着现代性和现代化所固有的危机和体系性的失败。它们似乎都对现代性持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相对主义及空间和地点的生产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中,哈里·哈鲁吐尼安对现代时间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幽灵似的比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现代性分析中对空间特权的争夺。他开始于在西方所产生的有关现代时间和空间的知识,并逐渐将他的批判扩大到东亚知识的生产上来。他并没有在西方与其他之间划出一条线。相反,通过强调现代性的分析是如何具有一个特权空间的,哈里吐尼安愿对现代性话语是如何普遍构筑起特权空间和本质化的地点进行批评性关注——国家,特别是国民身份,也包括像西方和东方这样的地缘政治的抽象。那么,他的目的是找到一种新的研究现代性的方法,它不再陷入到空间抽象以及像国家或西方这样一些总体化概念之中。

他所展示的空间特权化导致一种系统性地不愿面对时间性的思想,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他的说明中,空间化不仅仅是不情愿或无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他一开始将他系统性地拒绝处

理时间性与一个特殊的学科联系起来，这就是区域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框架是比较的，因而也是空间化的。他引用约翰尼斯·费边的作品，指出比较方法论的效果，以及它的使命，就在于否定其他社会的同代性或同时性。观察者看另一个社会仿佛是生活在另一时代之中，这另一个时代可被观察者理解和接近的原因，就在于他将之放在人类发展或社会进化的一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实际上，与它拉开距离，将它空间化。从费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这位观察者是西方人类学家，他将西方当成一个典范，用它来为其他社会的时间性估价和分类。

现代化的理论，特别是那种坚持要将美国的战略利益普遍化的美国版现代化理论，可以被看成是这一比较框架中的一个变种。这一变种将美国放在现代发展的顶峰位置上，而将其他的社会看成根据它们离这一典范的距离而各居其位。西方社会之中的历史性断裂被否定和移植，成为西方与其他间的断裂。在现代化的理论之中，只有一条道路，一个目的，其他的社会都走着这条道路，就看它们能不能赶上了。（它们当然不能赶上，日本在“泡沫年代”中的经济上的成功所造成的种族和历史的动荡——例如北美和欧洲的日本冲击波，以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显示出现代化的理论是如何的脆弱而不稳，以及对它的反应会是多么强烈。）当然，如果非西方社会不能“足够”现代化的话，它们至少应对吸入某种程度的美国化或全球化持足够顺从的态度。

哈鲁吐尼安主张，赋予空间以特权，或者“空间化”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站在现代化一边。甚至那些反对现代化的论点也不可避免地复制它——只要它们坚持将关系空间化。实际上，哈鲁吐尼安将空间化看成是与现代化以同一种方式运作：它非总体化（分成相等的部分），仅仅是为了再总体化（重新参照西方、现代性，或者一种单向度的全球时间或体系）。其自然结果是，由于他强调知识的生产（关于现代性的话语），他将这种非总体化与再总体化的倾向与学科的构成联系起来。一方面，他发现了一种也许可被描绘为“人类学化的”姿态。这种人类学化的姿态通过强调地方身份而克服现代化的总体性力量。这种人类学化的姿态依赖于在地方的基础上对地方身份的建立。它使具体的地点成为统一与身份的处所。然而，哈鲁吐尼安提出，地方身份的产生因此而与空间或地点联系起来，冒着无异于使世界非总体

化并因而能够再总体化的危险——即严格意义上的非地域化以便重新地域化。在他的说明中,着重点被放在了作为“地点——身份”的国家之上。然而,他也提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当前在文化理论中流行的倾向,这种理论努力通过地方身份的碎片化和多样性而废止国家的统一和身份。确实,他暗示了近年来用全球与地方这些术语进行谈论的兴趣,正是由于它仍存在于同样的空间逻辑之中,也许呈现出一种普遍与特殊逻辑简单的强化(现代性与国家,或者西方与其他)。

在他的陈述中,具有巨大的不断再总体化或重新地域化的危险性,这是因为,人类学化的姿态尽管是无意的,(另一方面)却依赖于也许可被称为一种“同步化的”姿态。这种姿态在比较研究中变得非常明显。如果身份仍是身份的话(即自我认同),它们就必定通过空间上的分离而维持它们间的不同。然而,当人们对它们作比较时,就必须假定一种潜在的,或者统领一切的同时性或同步性,一种时间的框架,在其中所有这些不同的身份以某种方式平等或均衡地同时存在。实际上,诉诸同时性话语使得不同的身份变得相似,都能接受现代化或全球化的过程。同步性产生出认同的差异。换句话说,空间特权话语的主要问题在于这种话语重视“社会间的差异”胜于“社会内的差异”。如果哈鲁吐尼安转向时间性问题是反对空间化,那么,这正是为了引起对社会内的不平衡性的关注,这在“非同步的同时性”的日常经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转向了存在于“将自身的资源用于转变资本主义现代化”之中的被体验和实施为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时间上的分离和不谐和。因此,他提出,日常生活也许可以具有一种新的对现代性进行比较的框架,这个框架注重于在现代化的社会之内或跨越诸现代化的社会进行生产和再生产,这个框架也以重新思考现代性的时间性为基础。

1942年在日本召开的一个名为“近代的超克”(“克服现代性”)座谈会,讨论了日本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为他提供了一个将隐含在对现代性进行空间的思考的对处所进行本质化的重要例证。正如哈鲁吐尼安所说,“近代的超克”的根本问题在于日本知识分子将现代性与一个空间统一体(西方,特别是美国,被看成是现代性的地点)之间划等号。这迫使知识分子将现代性完全看成是模仿或再造那个模式,这当然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于是,知识分子就复原这种不可能性:日本的一切不适合于美国模式的,都被看成是失去的统一体,对

真正传统,以及对本土性的残留和提示。通过这种对一种失去了永恒真诚性处所的强调,哈鲁吐尼安察觉出了“现代主义的”话语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性。

“近代的超克”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它的反应,也成为孙歌文章所关注的问题。孙歌的关注中心也是在于知识分子与她所谓的“官方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性。同样,她提出了现代性(现代主义)话语和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甚至在她探讨知识分子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性之时,她也继续将关注点放在“近代的超克”问题中的种种可能性之上。

一方面,她强调,对“近代的超克”的种种解释绝大多数都对它持贬损的态度。他们将这种话语不仅看成是与集权主义意识形态共谋,而且看成是对它的继续。简言之,对于绝大多数解释者来说,这次会议,以及“近代的超克”这个概念本身,只是导致全面战争的意识形态在知识界的合法化。同样,似乎与此相对应,孙歌自己总是提醒她的读者关注这次会议的历史时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着使日本知识分子中的反对声在面对日本在亚洲的战争被平息的作用。在日本攻击珍珠港之后,反西方的声音联合了起来,知识分子逐渐接受,而不再挑战这样的观点,即反对西方意味着解放东方。

另一方面,孙歌总是在问人们随后所解释的“再抵抗是无用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在实际上宣称抵抗是完全不存在的。她特别指出,那些采取对“近代的超克”取“超越的立场”的评述者,将之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共谋关系,以避免存在于日本的,或非西方的现代性中的难题。她从一开始就暗示了组织这次会议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与所邀请的学者和哲学家之间的一种可能的不和谐。作家们倾向于坚持,日本已经通过将他们所认为的本质上的日本美学纯粹化而克服了西方现代性,这种日本美学是一种以传统艺术与文学为代表的对世界的感性的、具体化的方法,他们将之与20世纪30年代反对美国化的大众文化的纯文学的复兴联系起来。照孙歌看来,这些学者清楚地意识到存在于那种已克服了西方现代性的说法中所固有的困难。孙歌从这一内在矛盾之中看到一种在相对与绝对之间的游戏,学者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将日本设定为一个绝对,其他国家则具有相对性,没有能克服西方现代性。然而,学者的洞见是以重复日常生活和差异为代价的。学者们几乎是不加审视地赞同日本是一个将来(亚洲的)绝对

的观点,其他东亚的文化和地缘政治构成具有与它相关的相对性。

因此,孙歌嘲笑了存在于“近代的超克”内核之中的一种“双重意识”,她显示出,这次会议既与西方共谋,也反对西方。此外,她还提出,即使这种知识分子的抵抗被证明是无效的,随后而来的忽视或否认他们的双重意识问题的解释者们也通过将之完全置放于日本之外(并因此而置放于历史之外)仅仅防止了抵抗。孙歌的提议中最有意思的问题是,在“近代的超克”之中或与之相关,最基本问题是用相对和绝对的术语来思考而不是用关系来思考的倾向。她写道:“这种差异是在关系之中,在叙述它们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只有当对这种效果的意识破产之时,日本与西方的差异才崩溃(甚至当这种差异被具体化之时也是如此)。”当一个人将西方的现代性确定为一个绝对之时,他就建立了一种情境,其中重复必定会导致相似。这就是说,要想成为现代(现代化),就要与西方相似,要西方化。日本从来不是现代性的处所,而仅仅是现代性的否定(即作家们所说的“近代的超克”),或者是它的相对化(学者们的观点)。从本质上说,他们的问题是重复而没有差异。“克服现代性”思想本身确立了一种在相对与绝对之间运作的活动,在其中重复只能造成相似,而不是差异。这是因为,重复的差异已经被捕捉为与西方相似。

孙歌对“近代的超克”的再思考起关键作用的是竹内好的思想。据孙歌看来,他的重要性在于将不确定性引入了克服现代性问题。她从竹内好那里看到一种坚持在霸权之中,以及愿意在集权主义之中寻求对集权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或者“在其中的差异”潜在地造成了一种对现代性和对日本的不同的理解。尽管现代性是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震惊而来临的,它也是来自日本内部的震惊(同样也是来自东亚内部的震惊),这一震惊必定会不断重复。否则的话,日本的现代性就与作为西方化的现代化,即逐渐与西方相似的过程,没有什么区别了。然而,这种震惊的经验并不是单一的,仿佛是一次性完成的“现代意识”。这是一种“双重意识”,在其中重复被体验为震惊性的,几乎是创伤性的差异,以致于达到失去所有对相似性的把握的程度(并因此失去自我和身份)。孙歌笔下的竹内好说到,这种自我丧失的结果似乎是日本的成功之处,即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主体性(一个人必须失去自我才能获得自我)。然而这种主体性,这种日本,不是一个“国家”或“地点”,更不是一个“家园”。对于孙歌来说,现代主体性是一个真